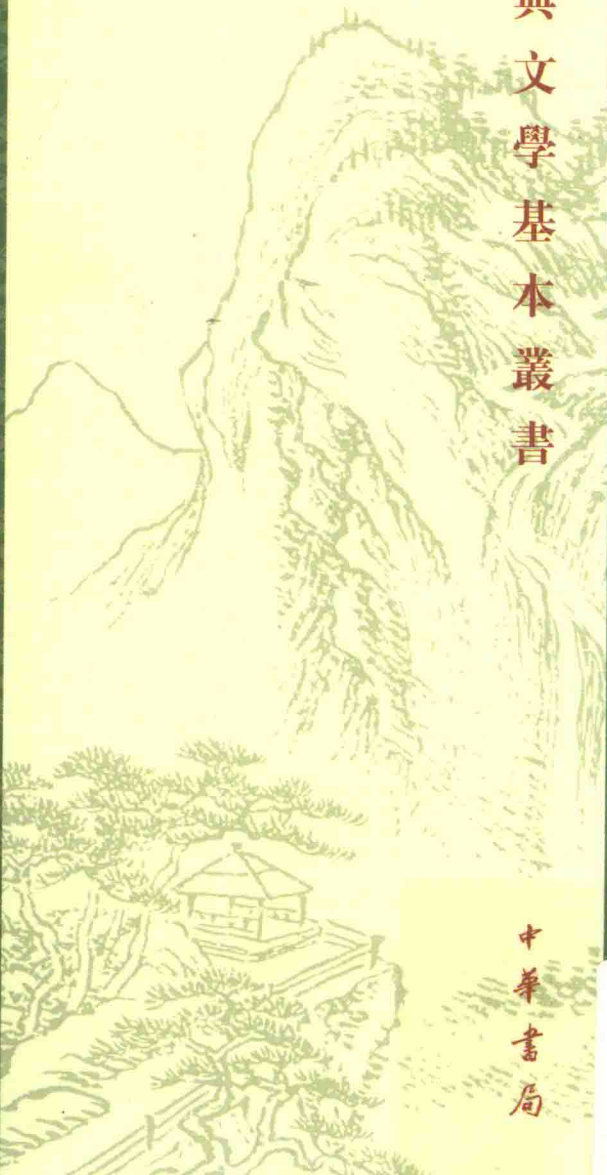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建安七子集

(修訂本)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建安七子集
(修訂本)

俞紹初輯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建安七子集/俞紹初輯校.—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10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1632-8

I.建… II.俞… III.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三國時代 IV.I21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48500 號

初版責編:戴燕
李忠良
修訂責編:馬婧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建安七子集(修訂本)
俞紹初輯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印張·2 插頁·396 千字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58.00 元

ISBN 978-7-101-11632-8

前言

建安時期，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一個創作繁榮、成就突出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著名作家，除「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外，當推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七子」，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世稱「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生活年代，從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一五三）孔融出生，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徐幹最後去世，前後共六十餘年，正處於漢末社會動亂的時期。東漢王朝自桓帝時起，宦官和外戚互相傾軋，輪流把持政權，政治日益腐敗黑暗，加以他們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掠奪，激起了靈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的黃巾大起義。這次起義雖在地主階級聯合武裝力量的血腥鎮壓下失敗，但東漢王朝也因此而一蹶不振，氣息奄奄了。隨之而出現的便是持續近二十年的軍閥大混戰，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在軍閥混戰中，曹操表現了出色的才幹。他於建安元年（公元一

九六)迎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諸侯,控制了朝政,成爲實際上的統治者。他又「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舉凡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績,終於削平了大小軍閥的割據,統一了北方,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與劉備、孫權各據一方,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建安七子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都親身經歷了漢末的動亂,建安元年以後又相繼從各地投奔曹操,成了他手下的著名文士。隨着東漢王朝的崩潰,儒家思想失去了支配地位,漸趨衰微,這爲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由於曹氏父子對文學的喜愛和倡導,吸引了大量文士聚集於周圍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因此,在曹操統治的地區內文學取代了傳統的經術,得到了空前的繁榮。鍾嶸詩品序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可見當時盛況。在爲數衆多的作家中,七子表現得十分活躍,也最引起時人的矚目。他們除孔融一人外,都是曹操所支持的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成員,常與曹氏兄弟詩賦酬酢,送相唱和,寫出了大量的作品。建安文學繁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他們與曹氏父子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七子中,孔融的情況與其餘六人頗有不同,他不是曹氏父子的僚屬,也未及參與鄴下文人集團的活動。孔融(公元一五三—二〇八)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是孔

子的二十世孫。他年輕時以「逸才宏博」而名震遠近，靈帝光和、中平年間先後爲司徒楊賜和大將軍何進所辟。董卓專政時，以忤卓旨出爲北海太守。及至建安元年，因與曹操「有舊」（見通鑑卷六十二漢紀五十四），被徵召入許，任將作大匠，後遷少府。建安十三年，拜太中大夫，被曹操借故殺害，死時五十六歲。綜觀孔融的一生，在政治上缺乏遠見，無所建樹。他恪守儒家的所謂「君臣大義」，抱着「濟危靖難」的雄心，企圖挽社稷於將傾，竭力維護東漢王朝的統治。正因爲如此，他在建安之初把曹操看作「勤王將領」而表示衷心擁戴，但到晚年一旦發現曹操「雄詐漸著」，便「數不能堪」（後漢書本傳），事事加以反對，從而造成一生的悲劇。孔融爲人傲誕任性，不拘小節，是漢末清議之士向魏晉名士轉變的代表人物。他又具有不畏權勢、愛才敬賢的品質，這正是他常爲後世士大夫所稱道、敬仰之處。

孔融是七子中唯一沒有賦作傳世的作家。他今存詩七首，其中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不過是「以文字示其巧」（葉夢得 石林詩話卷中）的文字遊戲，嚴格來說不能算文學作品。雜詩二首，或感慨身世，或悼念亡子，都寫得慷慨激昂，淒楚動人，在建安詩作中也堪稱上乘，但真僞莫辨。六言詩三首，在藝術上無甚可取，不過詩中反映了漢末的現實，以及孔融初入許時對曹操的態度，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臨終詩則是絕命之筆，痛叙自己忠

而見讒，情辭憤切。總的說來，孔融的詩歌成就不高，胡應麟詩藪說：「北海不長於詩。」是符合實際的評價。

孔融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方面。他在北海時寫給僚屬的教令，被史書稱爲「辭氣溫雅，可玩而誦」（魏志崔琰傳注引同馬彪九州春秋），看來是深受當時欣賞的。從現在保存下來的教令來看，大多以禮賢愛士爲其內容，顯得高雅雋永，確實別具一格。如繕治鄭公宅教、教高密令等都寥寥數語，便把那種渴慕賢才、急人所難的心情表露無遺，令人想見其氣度風采。一些與友人的書信，也寫得典麗溫婉而又富有情趣，字裏行間洋溢着熱烈誠摯的感情，同教令一樣可以見出他爲人「寬容少忌」、坦率可親的一面。在孔融的散文中，最爲人所稱道的是那些帶有論辯性的文章，如論盛孝章書、薦禰衡表、難曹公禁酒書、汝穎優劣論等。這類文章，無論是陳述己見，還是駁難論敵，都感情充沛，鋒芒畢露，令人感到有一股強烈的氣勢流貫其間，大有不可阻遏之感。曹丕論論文說：「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文心雕龍風骨篇說：「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才略篇又說：「孔融氣盛於爲筆。」都說明了這些文章的風格特色。這種特色的形成，與孔融高邁剛毅的性格密切有關，此外在語言上駢散結合，排比句式的反復運用，因而取得音情頓挫，勁挺有力的效果，也是重要的因素。曹丕在肯定孔融文章的同時也指

出了它的不足：「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這確實是孔融某些論說文的弱點。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篇中曾舉出他的孝廉論，說「但談嘲戲」、「言不持正」就是一例。再如難曹公禁酒書，文中把酒的功用誇說到無所不及的程度，而且其所舉的事例又多是不根之談，就難免給人有持論不够嚴謹，近乎戲謔的感覺。儘管如此，他的散文感情濃烈，文字典雅流暢，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與東漢那些平板呆滯的散文相比，顯得生氣勃勃，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七子中以散文著稱的還有陳琳和阮瑀。陳琳（公元一五五？——二一七）字孔璋，廣陵射陽（在今江蘇寶應縣東）人。他知名頗早，中平年間為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被殺後，他便避難冀州，在袁紹手下任職。建安十年，袁氏敗亡，他才歸降曹操。阮瑀（公元一五九？——二二二）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年輕時受學於著名學者蔡邕，深得其賞識。建安初年，他為曹操所招，任司空軍謀祭酒，後與陳琳共掌記室，當時曹操的軍國文書，大多出自他倆的手筆。阮瑀於建安十七年病亡，陳琳則在建安二十二年與劉楨、應瑒同得疫癘而死。

陳琳、阮瑀二人的章表書檄聞名當時，典論論文稱：「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文心雕龍才略篇也說：「琳、瑀以符檄擅聲。」但他們的章表之作已悉數亡佚，現在所能見

到的僅是數篇書檄，其中以陳琳的爲袁紹檄豫州、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以及阮瑀的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最有影響。這些文章引古論今，陳說利害，都寫得洋洋洒洒，具有很大的鼓動性。尤其是陳琳的爲袁紹檄豫州，歷數曹操的罪惡，誇說袁紹的軍威，酣暢淋漓，一氣呵成，是廣泛傳誦的名作。比較而言，陳琳的文章更多地接受了戰國縱橫家的影響，善於鋪張，氣勢奔放，但有時也存在着說事過當、語辭繁冗的缺點；阮瑀的文章則得力於蔡邕，顯得穩健沉着，然其才情筆力似不及陳琳。他們二人都好用典隸事，講究對偶辭藻，文章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駢化的迹象。

在詩歌方面，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借用樂府舊題來揭露社會問題的篇什，十分引人注目。飲馬長城窟行寫封建統治者修築長城的勞役，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這在戰爭頻繁、世道離亂的建安時期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在形式上，此詩成功地運用對話揭示勞役制度的罪惡，展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構思新奇，別具匠心，即使放在漢樂府中也並不遜色。駕出北郭門行描述孤兒受繼母虐待的悲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社會家庭關係的冷酷無情，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漢樂府中的孤兒行。此外，他們二人還寫了一些抒情詩。如阮瑀的七哀詩、怨詩等抒發羈旅漂零、人生無常的感慨，較多地接受了古詩十九首消極方面的影響，情調不免過於傷感哀頹，但多少可以看

出當時動亂現實所造成的人們心靈上的創傷。在這方面陳琳的人生態度要比阮瑀積極向上，如其遊覽詩之二：「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在慨歎人生易過的同時，熱切希望及時建功立業，這種思想情緒在建安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徐幹、劉楨、應瑒三人年歲比較接近，都曾當過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學侍從。徐幹（公元一七一——二一八）字偉長，北海（在今山東 壽光縣）人。他年輕時就博覽群書，「言則成章，操翰成文」（中論序），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董卓亂起，便隱居不仕，以讀書自娛。約在建安十三年前不久，應曹操之命，出任司空軍謀祭酒，歷五官將文學、臨菑侯文學，於建安二十三年病亡。徐幹為人淡泊少欲，晚年更托病居家，一心從事著述，有中論二十餘篇傳世。

徐幹的辭賦曾得到曹丕的推崇，認為可與王粲匹敵，而上追張衡、蔡邕（見典論論文），但流傳至今的僅有數篇經過後人刪節的殘文，已無法窺見其全貌。又據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徐幹以賦論標美」，可知他的論說文與辭賦同樣是受前人重視的。從曹丕答吳質書極讚徐幹之中論推測，劉勰所說的「論」，可能是指中論。其實中論是一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曾鞏中論目錄序）的學術著作，並非文學作品。徐幹在文學創作上表現出

特色，且對後世產生影響的是其詩歌。他今存詩四首，以叙閨情為主要内容。如室思詩描寫女子對所愛人的思念，表現她期望對方回到自己身邊，而又害怕他中途變心的複雜心理，顯得纏綿悱惻，情意真摯。其中特別是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四句，用淺近自然的語言傾吐至情，尤見出色，自劉宋以後模擬者代不乏人，「自君之出矣」也便成了專寫閨情的一個詩題。

劉楨（公元一七五？——二二七）字公幹，東平寧陽（在今山東寧陽縣南）人，父梁以文才著稱於世，為漢宗室子孫。劉楨於建安初年應曹操之召入許，後曾隨軍北征袁紹，又參與赤壁之役。建安十六年，由丞相掾屬轉為五官中郎將文學，以其聰敏多才而深得曹氏兄弟賞愛。他性格傲岸倔強，因在宴席上平視甄夫人激怒了曹操，以不敬被刑，刑滿復職，終為臨菑侯庶子。

劉楨的五言詩向負盛譽，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鍾嶸詩品把劉楨列在上品，稱他的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又說「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可見在當時評價很高。從劉楨現存的十幾首五言詩來看，其取材的廣度及語言的豐富性比不上曹植和王粲，但也仍有他的特色。贈從弟三首採用比興手法，借物喻人。詩中通過對蘋藻、松柏、鳳凰的描寫，表示詩人對

於身處貧苦而心懷大志、不畏外界壓力而傲然挺立的美好品質的追求，確有如鍾嶸所說的「真骨凌霜，高風跨俗」的氣概。後世左思、鮑照等那些表現睥睨世俗、孤高不群的詩都從這裏汲取過營養。劉楨的詩還善於描景狀物。如公讌詩寫月下下的園林、泉流、花鳥、涼風，鮮明細膩，給人以清新秀麗之感。贈徐幹一詩，大約作於「不敬被刑」之際，主要抒發內心的苦悶，其中「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把自然界寫得生機盎然，有力地襯托出他當時失意落寞的心境，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他如鬪雞詩，刻畫鬪雞的姿態情狀也生動逼真，與應瑒的同題詩相比自要高出一籌。在散文方面，他的牋記之作曾被劉勰稱為「麗而規益」，說是「有美於為詩矣」（文心雕龍書記篇）。諫曹植書、答曹丕借廓落帶書等，文字簡約優美，往往通過精巧的比喻來點破事理，深刻而又形象，頗能發人深思，大概就是劉勰所指的作品。

應瑒（公元一七五？——二一七）字德璉，汝南南頓（在今河南項城縣西）人。祖父奉為司隸校尉，伯父劭官泰山太守，都是知識淵博的學者。他早年因戰亂曾漂泊他鄉，歸依曹操後，歷任丞相掾、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等職。應瑒有二十多篇作品流傳今世。別詩二首描寫羈旅行役的悲苦，情意真切；奔勢以歷史上著名戰役來比喻圍棋的各種局勢，雖有班固弈旨、馬融圍棋賦先例可循，但寫來別出心裁，也可見出作者學識宏富。他

其餘作品大都平平無足可觀。曹丕評論七子創作，於其他幾家多所肯定，而獨對應瑒只說「和而不壯」，別無讚詞，看來他的作品不甚為當時所重。

七子中數王粲年輩最晚，而文學成就最高。王粲（公元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陽高平（在今山東鄒縣西南）人，出身於豪族官僚家庭。曾祖父龔、祖父暢都位至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後曾在朝廷執掌機密，又出任郡太守。王粲十四歲時，遇董卓之亂，由洛陽徙居長安，深得當時著名學者蔡邕的賞譽，稱他「有異才」。初平三年，董卓餘黨李傕、郭汜作亂長安，王粲流寓荊州，依附同郡劉表，在荊州十六年，始終不受重用。建安十三年，歸降曹操，任丞相掾，受爵關內侯。魏國建立後，以軍謀祭酒拜侍中，曾參與制訂曹魏政權的典章制度。建安二十二年，隨曹操東征孫權，道中病亡，時年四十一歲。

王粲擅長詩賦，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篇）。他早年處於社會大動亂的時期，面對現實，不時發出深沉慨歎：「天降喪亂，靡國不夷」（贈士孫文始），「悠悠世路，亂離多阻」（贈蔡子篤）。他對於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也表示深切同情。如七哀詩第一首，為初離長安避亂荊州時所作，詩中先通過沿途所見所聞，生動深刻地描繪了大浩劫中的人間慘象，接着在篇末沉痛地唱出：「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憫時傷世、憂國憂民之情溢於紙上，讀來覺得沉鬱悲涼，感人至深。由於王粲長

期遭遇離亂，又痛感胸懷大志而無所施展，所以他在荊州後期的作品常常流露出身世不遇、有家難歸的苦悶，七哀詩第二首、登樓賦就是反映這方面內容的代表作。尤其是登樓賦，抒寫作者登上當陽麥城樓四望時所引起的鄉關之思、離亂之感，同時又表現了他渴望國家統一的理想和建功立業的願望，見出作者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通篇結構完整，造語精煉而又明白曉暢，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不愧為魏晉抒情小賦的傑作。歸附曹操後，王粲的政治地位起了變化，他常與鄴下文人詩賦唱和，寫出了不少公讌、遊覽、述征、贈答一類的作品。這些作品，就其現實意義和藝術表現而言，比不上前期的深刻有力，但仍保持着前期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其中從軍詩五首記述他跟隨曹操出征的經歷和心情，較有代表性。詩中熱烈歌頌曹操的統一事業，表示「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願為曹魏政權「輸力竭忠貞」，流露出積極入世、奮發有為的激昂情緒。儘管這種情緒多半出於報答曹操的知遇之恩，但曹操所從事的統一事業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普遍願望，理所當然應加以充分的肯定，王粲的這種情緒也就無可非議了。總的來說，王粲的詩賦感情深厚，境界闊大，語言也清朗簡淨又富於文采，因而無論是反映現實，還是抒寫懷抱，往往顯得才情橫溢而文質兼俱，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說明了他在建安文學中的地位。

王粲的散文傳世不多，却也自有其特色。其爲劉表與袁尚書及爲劉表諫袁譚書，從正反兩方面陳述利害，勸袁氏兄弟息兵修好，共同對付曹操，寫得有情有理，委婉懇切。有些文章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也頗有見地。如務本論，強調發展農業生產必須獎勤罰惰；爵論則主張應不失時機地論功賜爵，使「慕進者逐之不倦」。這些見解自然是從鞏固封建統治出發的，但即使在今天也不無可供借鑑之處。王粲的散文駢散結合，簡明流暢，在七子中可與孔融媲美。

如上所述，建安七子的文學創作成就不一，各有特色，但在創作風格上存在着共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七子身處亂世，曾目擊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各自也有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歷，對現實的苦難有着強烈而深刻的感受，加上他們大多出身於儒宦世家，受儒家「經世濟民」的思想影響較深，在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抱負，不同程度表現出昂揚奮發、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因此，他們的作品，不論是反映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還是抒寫自己身世不遇的感慨，以及對建功立業的追求，莫不充溢着慷慨激昂之情。劉勰在談到建安文學的時代特徵及其形成原因時指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篇）「慷慨多氣」也正是七子創作的共同風格，說明他們對建安文風的形成是作出了貢獻的。

七子在文學史上的貢獻，還在於通過他們的創作，促進了各體文學的發展。就詩歌而言，七子的成就主要在五言詩方面。五言詩起源於西漢，東漢時雖也產生了像古詩十九首這樣比較成熟的作品，但這種新興的詩歌樣式不為當時文人所重，創作者甚少。到了建安時代，由於建安文人大量寫作，才打破沉寂的局面，把五言詩推向繁榮。文心雕龍明詩篇在論述建安詩歌創作時曾經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由此可以見出，這時五言詩的蓬勃發展是與七子和曹氏兄弟等人的共同努力分不開的。七子的五言詩，在古詩的基礎上繼承了漢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又吸取了漢賦善於鋪敘狀物的特點，在反映現實、抒寫懷抱及描摹景物上一般都能做到曲盡其意，質樸而缺乏文彩，表現出強烈而深厚的感情。五言詩在七子和三曹手中，已經完全成熟，此後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一種主要形式。

在建安時代辭賦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以抒情詠物為主要内容的小賦，取代了兩漢時期「鋪采摛文」的大賦，佔據了賦壇的主要地位。就七子現存的作品看，陳琳的大荒賦，宋人吳棫曾見過全文，稱其「幾三千言」（韻補書目），又劉楨的魯都賦、徐幹的齊都賦似

模範班固、張衡的「兩都」、「二京」，當均屬於大賦，其餘則幾乎都是抒情小賦。這些抒情小賦或言志述懷，或紀行詠物，較之以往張衡、蔡邕的同類作品，題材範圍有所擴大，並且描寫細緻生動，文字清麗流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詩賦互為影響，二者除句式不同，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上已無甚區別。這種詩賦合流的傾向，在七子的創作中有着明顯的反映，極大地提高了辭賦的藝術表現力，為後來六朝抒情小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至於七子的散文，都好用典隸事，句式多用排比對偶，已經明顯駢化，他們在兩漢散文向六朝駢文的發展過程中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總之，建安七子同三曹等建安文人一起，對於建安文風的形成，各類文體的發展，作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績。韓愈在薦士詩中說：「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對他們勇於變革的精神，以及在文學史上作出的貢獻，無疑是應加以充分肯定的。

建安七子諸家詩文集，隋書經籍志皆有著錄，大約到宋代便先後亡佚，現在所能見到的是明清人從唐宋類書、總集及史乘中撮鈔而成的輯本。其中以明楊德周彙刻建安七子集本（有曹植而無孔融）、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缺徐幹），以及清楊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本等較有代表性。此外，明馮惟訥古詩紀和清嚴可均全上古